

服饰文化研究要拓展视野,提升高度,更新理念

文 / 华梅,任云妹,刘一品

摘要:世界上关于服饰文化的专门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从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开始的,而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即有哲学家以服饰现象为论据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服饰文化研究在中国境内蔚然成风。如今,要想使研究向更纵深方向发展,就不能固守以往的理论,必须采用新理念,如世界人眼光、多维空间、非线性思维以及零和关系等,这样才能使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世界人;多维;非线性;零和;服饰研究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经快过半,服饰文化研究队伍也已经壮大且遍及中国,但是,究竟有哪些突破呢?这是一个需要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反复重复别人的话或自己的话,哪怕是再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已跟不上新的时代步伐。以往的理论高度是一个台阶,而今我们需要站在原有的高度上再向新目标攀登,当务之急便是更新理念。起点便是走出服饰去研究服饰,研究服饰也不能仅限于服饰本身,而首先是社会文化,因为服饰是人创造的,又与人一起构成服饰形象,从而进入社会生活的。

服饰,泛指衣服与佩饰。以“服装”二字概括,与此同义。服饰与服装实际上都包括衣服(主服、首服、足服)、佩饰、化妆和随件四个方面。它既具有物质属性,又具有精神属性,也就是说既可保暖御寒,又可表示喜庆与悲伤,同时标识着民族、区域与时代的特征。这样看来,服饰绝不只是物质产品,它同时渗透在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祈福求祥,除灾去病。随着媒

体形式的增多,服饰作为视觉形象越来越牵涉进政治态度和生活理念之中。这就等于说,服饰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与角色,不能仅限于艺术,而应该放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我们的服饰研究向纵深发展。

1983年,教育部决定在高校设立服装设计专业,各类服饰教材相继推出。这一历史阶段,对于服饰的研究主要限于服装历史沿革或索性就是对于服饰品的考证。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它实质上是为服饰的全方位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不再满足于服饰考证上的惊喜,“时装”作为又一个服饰研究课题占据了相当的空间,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与此同时,以大文化为背景来研究服饰的呼声愈益增强,笔者(华梅著)拙作《人类服饰文化学》就是在90年代中期间世的。当时以百万字的体例,提出一个新的服饰研究理念,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东方服饰设计审美研究》(12BG063);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研基金(52WT1107);天津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基金(52WU1313)

作者简介:华梅,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任云妹,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助理研究员;刘一品,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助教

以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服饰艺术学的框架,组构成一个新的研究体系。这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研究服饰要从立体去着眼,去探讨。因为服饰并不是悬浮在社会生活之上的,它本身即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新世纪已经越过了13年,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来说,目前都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时代不容许人们再以旧有的理念去维持现状,甚至说再以陈旧理念行事连现状都无法维持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机遇与挑战是我们必须以现代理念去研究服饰。政治术语中有一句话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社科领域或说艺术门类中的研究工作,同样需要我们与时代同步。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不进步就是倒退,时代已容不得迟缓,迟缓就等于在竞争中自动出局,迟缓就等于丧失生命。

今日研究服饰,亟需拓展视野,更新理念,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需求和时代需求了。现代理念不是空话,它是有所依据有所归属的,施行起来也需要符合这个大数据时代。

1 以世界人眼光研究服饰

众所周知,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名,即是源起于华夏民族主要聚居并建都于中原,而中原之称又因“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礼记·王制》),而形成“中土”、“中州”、“中夏”之说。《诗经·小雅·六国序》里写道:“《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中国古人总认为自己是居于中间的,少数民族分别居于中原的四周;中原人是开化文明的民族,而边远的少数民族则是野蛮落后的。《礼记·中庸》里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以蛮貊。”将中原四夷统称为中国。《史记·天官书》中写道:“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从那以后,尤其是到了19世纪,中国专指我国全部领土了。其实,那时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证实的“地圆说”已经问世三百年了,可是中国人在近现代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在众

国簇拥之下的,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心。

西欧也存在这样的中心论,所谓近东、中东、远东之说,即始于西方国家向东方扩张期。距西欧较近的东方地区被称为近东,较远的称中东,虽然有时界限不是很明显,但被普遍认为属于中东地区的有西亚的伊朗、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十余个国家,东方的中国、日本则被称为远东。这种称谓就是以西方为主而形成的语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在生于1885年,逝于1981年的美国著名通俗哲学家威尔·杜兰的《东方的遗产》一书中,就将内容分为“埃及与近东”、“印度与南亚”、“中国与远东”。^[1]在过去的近百年间,西方人著书立说,凡称为世界的,实际上主要是西欧。在美国人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和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的《世界文明史》中,提及中国的文字篇幅极小;^[2]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布兰奇·佩尼著的《世界服装史》中根本就没有中国,甚至连东方也没有。

世纪之交的西方学者,已经逐步摒弃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开始客观地以全球观点来研究文化。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家教授L·G斯塔夫里阿诺斯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在他著述并已被社会承认为权威著作的《全球通史》中,特别强调“走向全球化”。中国学者张广勇在该书导论中说:“纵览今日的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在发生着急速的变革,‘全球村’的预言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们,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者奉行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政策,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3]是的,西方学者在他书中的第二编即安排了关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而且不仅提到希腊和罗马,同时提到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

出生于1945年的英格兰人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在轰动世界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刚提及“前工业社会——第一章:西方的兴起”时,即首先提到“明代中国”,而后是“穆斯

林世界”，再后是“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这一章的最后论述才是“欧洲的奇迹”。^[4]不难看出，当代西方学者已经关注这种世界人的角色与视点，十分重视全球事实，而不再拘泥于原有的狭小的“自豪点”。

有一本当代美国女学者李露晔的书，名为《当中国称霸海上》，主要是论述郑和七下西洋。本来笔者感觉她掌握的资料和论述的深度无法与中国学者相比，但认真读过以后，发现她的世界人学术态度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是中国人，她对郑和功绩的了解也许不如我们的学者深刻，但或许正因此，使她成为从外部世界来探究这一事物本原的陌生或说崭新的人。^[5]冷静的态度，客观的立场，尤为触动笔者的是她将郑和与达·伽马加以比较，丝毫没有贬扬，没有西方人过去那种傲慢的态度，这才是当代学者所应该具有的研究精神。

由此我们想到服饰文化，我们研究服饰文化也不能再拘泥于过去那种先论中国，再论西方的惯性模式。虽说如今不能再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的衣冠大国雄风确实也属昨天，但主要是不能再将中国与西方或其他地区割裂开来，这已经显得有些陈旧。今日的教材还在延续这种思路，那是为了让学生一目了然，可是研究服饰却不能再以这样的思维来确定模块。世界人研究服饰，就应该以全球观点去分析。在1995年出版的《人类服饰文化学》中，笔者（华梅）已尝试着将中、西服饰史写成人类服饰史，二十年后再来看，笔者（华梅）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只是还限于将中、西及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美洲原生地以及太平洋岛屿几个区域拼接起来的思路，未成熟到将其综合论述的地步，也就是说，当时尚未开放到这种大胆的探索阶段，或说还不具备这种以世界人眼光论述的能力。

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曾任美国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的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有名的一

本书中已经完全以世界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了，这本书的名字叫《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如“普世文明”，如“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如“文明的集结”，都是从全球政治的角度去考虑的。我们不能说他已经将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霸道的思想行为舍弃彻底，但至少可以说，他在作为学者去研究国际政治时，尽可能站得高一点并力求全面、客观。^[6]

研究服饰也需要这种全新的学术理念，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之一。

2 按人类史断代思路研究服饰

多少年来，历史断代已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较为稳定的模式，人们习以为常，认为不如此就不是规范的历史书籍。具体到服饰发展史来说，人们（包括著书人和读者）已经习惯了一种断代方法，并以为这就是恒定的符合规律的最佳模式。

在中国服饰史中，有史前说，也有先秦说。由于一般工艺美术史中原始社会陶器、石器非常丰富，奴隶社会青铜文化又十分灿烂，所以这两个阶段以后才到战国。而服饰品由于衣服织物不易留存，因此先秦遗物较少，有以先秦为第一章的。总之是以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为基本断代格式。

在西方服饰史中，总是起始于埃及。然后是美索布达米亚，再以后为希腊、罗马、拜占庭、文艺复兴、巴洛克、罗可可。人们认为史是不可改变的，再细分，还忘不了哥特或维多利亚时代。中国习惯以朝代来断代，西方则习惯以民族国家或艺术风格来断代，这种方式已延续了很多年。

如今学术界开始审视这个问题，回想起历史上许多名家早就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观点，如公元前2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罗比阿，他生活在罗马统治地中海的时代。他在所著的《通史》中认为，倘若试图从那种仅与特殊事件有关的历史来了解这些活动，那么则与试图

依靠访问最有名的城市或观察各个彼此无关的计划来获得有关整个世界的构成、性质和秩序的观念一样,都是毫无希望的;那种认为仅仅根据研究个别的历史,便能求得关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正确认识,这种观念只能是一种幻想。

断代问题与世界人问题是一致的,都牵涉到新的学术角度;都存在着如何改变国别史或地区史拼凑组合的思维;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即如何在社科研究中将社会事物或社会发展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研究的方法问题。我们在《人类服饰文化学》中曾尝试着设定了一个人类服饰史的断代方式,那就是“服饰晨曦”作为第一部分,因为全人类都存在着一个服饰起源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草裙时代,第三部分是兽皮披时代,这也是全人类都曾经走过的路。尽管在公元记录年代上人们的着装存在着先后的差异,但就人类服饰的发展来看,这种早期特征是共有的。第四部分是“服饰成型时代”,下面依次是“服饰定制时代”、“服饰交会时代”、“服饰互进时代”、“服饰更新时代”、“服饰风格化时代”、“服饰完善化时代”,最后是“服饰国际化时代”。这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应该说是比较新的断代方法,现在看来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还属于较早运用现代理念的科学研究态度。^[7]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运用了一些宏观的断代法,如“文明前的人类”、“欧亚大陆古代文明”、“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等章节。在“革命的西方文明”一章中,有“发展中的经济”、“民族君主国的崛起”、“信仰的时代”、“西欧的扩张主义”等小节,并提出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如“人性的本质”、“文明:是祸还是福”、“发达社会和‘遏止领先’”、“历史中的民族”等。这种断代法已经说明,由各自国家或地区的断代法过渡到拼凑式断代法是一个进步,但还有明显缺憾,再由拼凑式向有机结合式过渡并趋于全球一统式,才是当前所需要的研究态度。

3 以多维空间概念研究服饰

说起多元来,似乎大家已非常熟悉,这说明近二十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事物并不是呈直线发展的,社会现象也在说明社会事物不可能按照原来的那种单一模式运行。通讯的发达使一切联络显得简单便捷,信道的缩短与多样化已使人们从刚开始时对信息的应接不暇而变得沉稳老练了,人们已善于从铺天盖地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东西,以此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资源。

在世界如此绚烂多彩又瞬息万变的时候,社科研究人员已发现我们工作思路不能再停留在原来的一维空间。过去的研究中,有许多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如19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很大的法国丹纳著《艺术哲学》,曾经引领着人们的艺术思维,那种富有哲理的思辨与批判,对人们震动很大。可是现在想起来,在丹纳论述的艺术发展中,没有适度地提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艺术是有自己的特性和特殊的规律,但是不可能脱离开社会生活。同样的问题也显现在我们的科研中,如中国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人文书籍,作者显然过分地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因此削弱了艺术的真正性质与表现力。^[8]

笔者(华梅)在教学中发现,笔者(华梅)的研究生由于有些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没有经历过中国“文革”十年,因而在摘引资料时难辨正误,故而在21世纪的论文中,仍出现按照阶级或阶级成分论来分析事物的偏激言辞。再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研究生教学单位,注重让学生早早确立较为狭窄的研究方向。笔者(华梅)不反对学生进行专项研究,学生的未来也确实应该成为专家。但是,以专项课题来带动学习与科研的方法是可取的,过早将学生固定到某一专项的做法却是不利于学生发展的。我们强调了三十多年,欲建事业大厦必须有宽大而且厚实的基础,否则的话,沙漠上立一根竹竿,既不会太高也经不住考

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科学研究中的一维思路是行不通的,尤其在现今这个多元的世界。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多维空间的思路,论述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到多主线、多平台,比如说,如今市场力量在左右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思潮虽说时变时新,但同时还是立体交叉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必须相应以多维空间概念去进行工作。

笔者(华梅)曾认真阅读了一下文化艺术出版社在2005年8月出版的《自由之路》与《西方的智慧》。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其中的《自由之路》完成于1918年;《西方的智慧》则出版于1959年,20世纪90年代被译成中文。爱因斯坦曾说过:“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从年代上看,两部书著述与出版都比较早,可是罗素的学术思想已经超前,他完全突破了惯用的一维空间,而向多维进发。在《自由之路》中,既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又说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在第二部分中,既涉及1894年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的米哈伊尔·巴枯宁,又引出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庄子。笔者(华梅)姑且不去评论罗素说的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事实,但必须承认他掌握的资料太丰富了,而且不是生搬硬套,他将这些有助于研究主旨的资料深入研究以后,论述起来纵横捭阖,融汇贯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多维世界的理论,它绝不是线性的。多主线、多平台的研究方法已经进入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线性思维明显囿于过去的时代。^[9]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意观察社会动向与各种事物的运行轨迹,注意搜集相关的各种资料与最新信息。当然,能够做到这些的前提是具备一定的洞察能力或吸纳意识,能够主动摄取本专业所需的“营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具有专业研究的主动性和时效性。事业心是保持事业发展的原动力,而主动意识和工作效率就是这种原动力的直接表现。

2004年开始,笔者(华梅)萌生了一个服饰跨学科研究的想法,并随之拟成学术计划的腹稿。2005年9月,笔者(华梅)利用在京开会的相对安静的环境,将深思熟虑的计划正式拟出,这就是一整套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的服饰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著作,待这部书出版之后,还可有更深入的如服饰信息学、服饰生态学等二级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研究的还有很多。多维空间是学术研究的新思路,非线性思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立体组构,交叉互进,多维空间,已经展示出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动向,只有这样,才符合新时代社会科学的需求。

4 零和关系与服饰研究

在中国学者张广勇1999年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写的导论中,专门提到如今政治经济界经常谈到的“零和”与“非零和”的关系。作者写道:“零和关系就是一方之失与另一方之所得相等。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所以,以前的各种社会都是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受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可资利用的自然财富是有限的,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和战争。在当代,由于人类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物质财富能满足所有人类需求的非零和关系的世界。这种新世界必将引发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前景的进一步思考。”

从目前的学术研究动态来看,“零和”问题常被人们提起,这是新形势迫使人们必须做出的新思考。在国际政治中,人们正在讨论中国与美国的“非零和”关系,也就是一方强盛,不一定另一方受损。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劳动力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在服饰研究中考虑到这一与“零和”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处理好了,或许可以打破原有的理念,使事物向着更有力的方向发展。

展。

从研究者身份来看,如今人们发现一人身兼数职,精通互不相关的几个研究领域或是出生与成长历经几个国家、区域,这些原来被认为不可思议的人物、经历,在过去的年代里常被认为只会属于少数几个“奇人”。如果是正常人,那将意味着他专业思想不巩固。中国有句老话:一心不可二用,荀子在他的《劝学篇》中特别强调:“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蚰蟥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螭蛇无足而飞,鼯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荀子的《劝学篇》曾长时间时刻给我们以鼓励,其中很多名言也被我们当成座右铭。我们至今告诫我们的学生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在强调专业形象时也常说:“相传鼯鼠能飞不能上屋,能缘(爬)不能穷木(爬到树顶),能游不能渡谷,能穴(掘洞)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10]我们的意思是说,在如今这浮躁的社会中不要干着这个想着那个,到头来哪个都不行。今日看来,荀子说得没有错,我们的理解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时代发展了,我们也必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辩证地看待古人的教育思想。

比如说,我们不能再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当然也不能整天东忙西忙,毫无主旨。由此引发我们的思考,这些问题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力较弱,那还是就干好一项工作,不要想得太多,只是这样的研究容易落入肤浅或一维,不容易把事业做大。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能力涉猎多项,那就可以一专多能。从这里,我们理解了服饰研究人员面对的零和关系,那就是,不一定多

顾一项就耽误了另一项,有能力的人可以驾驭多项,而且往往因为这种优势促进了事业的发展。

回想美术史上有名的意大利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他被誉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绘画作品《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可是,他远不止是一位画家,他同时在艺术、数学、机械工程、医学、地质学以及物理学等几个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被人们总结为一个有探索精神和创造智慧的通才。当然,举这个例子也许离我们太远。再翻开《自由之路》,会看到作者罗素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还是数学家。通常我们认为搞绘画的一般不大识数,事实证明,不完全是这样。这些例子似乎已经说明了,不一定在一个领域有造诣,就势必会影响他在另一个领域成为佼佼者。我们从这一固有的认识框架中将思想解放出来。也许思想放飞了,我们会有很多新发现。

比较学在中国兴起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人们惯用的出发点是中国,因为中国学者了解本国文化较深、较多、较全面,所谓的比较学实际上是从中国的窗里向外看。但后来就不然了,出现一些“边缘人”,如《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作者金文学。他出生于中国辽宁沈阳,是朝鲜族,又多年在日本留学、任教。他的多重身份、多重经历以及所受到的多重文化教育,并没有像“邯郸失本步”、“狗熊掰棒子”一样,得一方失一方或索性都失掉,而是成功地体现出“非零和”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名“知识牧民”,哪里有知识的草原,他就往哪里游动。用一位日本翻译家蜂须贺光彦的话说,他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蜂须贺光彦很风趣又很严肃地说:“用动物来比喻的话,边缘人非蝙蝠莫属。从前(20世纪)人类社会比较忌讳或蔑视这种脚踏两只船式的人,而现在对边缘人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认为边缘人才是构筑两种文化和社会桥梁的人,随着全球化

的进展,边缘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说到边缘人时,日本学者指出“民族学上的边缘人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特指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之间,却不隶属于一种文化,而是共有两种文化,并以此为生和创造根基的人”。他讲到21世纪时,专门指出“以中国的林语堂为代表的脚踏东西文化的人物,为东西文化共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涉及的只是研究人员本身的零和关系,当我们研究服饰时,会发现服饰设计、制作、营销以及宣传等各个环节,实际上都存在着零和关系。在过去的多少年里,人们在技术上或在客户联系上都防备着同行,生怕另一方获知以后会使自己受到损失,包括师傅带徒弟,都不敢把最拿手的绝技传给徒弟,唯恐徒弟掌握了会使师傅失掉饭碗。如今一些服装企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技术倒是因流水线等进口先进设备而难以保密,但一些原料供给和销货渠道都不愿意让同行知晓,认为交给另一方就会使自己自然地失去一部分利益。曾经有一句时髦的话,叫“分蛋糕”,形容获得财政项目或赚取利润为切得一块蛋糕。如果用固定的狭隘的眼光来分析,当然是分蛋糕的人越多,每人得到的也就越少,而且一方切取得多,肯定另一方或另几方就会比预想得少。但是换个思维方式来思考,如果大家携起手来把蛋糕做大不是对各方都有利吗?也可以这样说,零和关系与非零和关系是一个新时期的新现象,不一定能显示或说明所有问题,但至少说明我们从事科学研究或具体到服饰研究,确实可以拓展视野,放开思路。如果能够在理论研究上对服饰文化学进一步实践的话,那将意味着更大的成功。

5 服饰研究要与时代同步

在这里,首先要确定服饰研究的宗旨,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面向哪些部门和受众?服饰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哪些形式?我们如何将模块化研究和视觉传达、信息接收、市场运作结合起来,并使之与时代同步?首先说,服饰研究

不是空对空的,不是纸上谈兵,服饰研究直接作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诸如心理学、民俗学和史学等等,并会对广大民众产生深远的素质影响;服饰研究还可以作用于工商业,通过总结分析来指导一线人员更顺利、更便捷地取得胜利,其中获得信誉支持或赚取商业利润等都是胜利的体现。在过去的岁月里,哲学家论述一家之言时总也少不了引用服饰或利用服饰。有一次,孔子去访问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既不戴冠,也不穿会客的衣服。孔子弟子说,夫子为什么要来见这样一个人呢?孔子说,这个人质美而无文,我要说服他,使他文起来。孔子走了以后,子桑伯子的门人问:先生为何要见孔子?子桑伯子说,这个人质美而文繁,我要说服他,使他去掉文。这个故事出自汉代刘向的《说苑·修文》中,估计根源于《论语·雍也》,那里有孔子认为其礼仪过简的论述。这样一段有关服饰形象的对话为什么被古籍反复记载并加以发展呢?原因就在于孔子认为服饰形象体现思想倾向。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些显然在突出儒家的道德标准,即中庸之道,而且孔子的一系列关于服饰的引申或论述都在强调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特别是“仁”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以及“礼”这一体现仁的表现形式。老子讲“被(披)褐怀玉,是为圣人”、墨子说:“衣必常暖,然后求丽”都在以服饰来说明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哲学思想,我们能说服饰文化与实际生产无关吗?服饰无处不在,只要有人,无衣也有饰件,世界上的人无论皇帝、总统,还是平民、乞丐,只要一出生,就会被服饰包裹起来,或说被各种服饰文化层层包装起来,包括民俗,也包括生理学、心理学,能说服饰仅是物质或普通产品吗?中国“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中,有10部专设《舆服志》,即政治制度中的车旗服御部分,能说服饰仅是艺术吗?

日前在科研中搞得很火的一种理论,叫做“混沌学”,这是一门以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中系

统的貌似混乱无规则,而实际有深层规律性与定常性的运动形态——混沌运动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混沌学正式发端是20世纪60年代,最初起始于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对大气湍流的研究,80年代已成为当代科学的一大“热门”,新世纪尤为引起大家关注。混沌学特点有几个:(1)具有内随机性,系统出现随机性,而且根源于系统内部;(2)对初始条件的极其敏感性,在随时间的变化中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3)非周期性;(4)整体稳定而局部不稳定;(5)有一定的定常性和深层的规律性,这具体表现为存在一系列普适性和自然常数。

另一个多被应用的就是“蝴蝶效应”,它与“蝴蝶突变”有一致之处,主要是说在社会领域中有政策受各种因素影响下出现的突变。“蝴蝶效应”在21世纪的社科研究中屡屡被提及,它也是源于气象学家洛伦兹的研究,因而与“混沌学”是相关联的。洛伦兹在研究“模型天气”时发现,天气中一个极小的变化,有时会导致气象的巨变。如巴西某地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引起的微小气流,与周围微风不断汇合,可能触发一场席卷美国某一州的大风暴。在地震爆发、冰川运动、股票涨落、心脏颤动、生命繁衍等随机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它们有着相同的变化机制:系统的输入和系统的输出之间有一种随机关系,并以误差的形式表现出来;系统输入初始值的极微小扰动,经过无数中介,到输出时会变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称为对初始值的敏感依赖。它多存在于具有内在随机性的非线性系统中,其实际运算的结果是无规则的。以前我们总试图对服饰流行给予规律性的总结,并由专门机构做出预测。事实上,这种预测常常会遭遇“突变”,一些流行也实在找不出时装流行的规律。于是,人们只能对此目瞪口呆。美国西部淘金工人的帐篷布裤怎么会流行于全世界?又怎么会以牛仔服的粗犷与率真征服了上层人物,诸如美国的卡特、克林顿和小布什等几位总统?作为时装,牛仔服为什

么会在百余年中保持着旺盛生命力?人们无法解释,只能将它归为时装流行中的“神话”。神话即是无法破解的,也无须破解,从如今的“混沌学”与“蝴蝶效应”等新理论的分析方法看,似乎解释起来也不难。这些说明,时代在前进,新理念在不断生成。它势必引导着研究的前行。

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今的社会科研成果形式不再是单一的,不但有纸质著作和媒体,同时又有电子读物和网络通道,微博、微信已无处不在。新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科学研究微至服饰研究怎能固守原有的模式与思路呢?

6 结语

进入21世纪已经十几年,很多新事物的生成与发展不是在沿着原有的轨道前进了。时代在向服饰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笼统地说就是需要一种新态度,但实际上还有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提到的世界人问题、历史断代问题、多维空间问题,零和关系问题以及服饰研究如何借鉴新的研究成果的问题等等,只是我们目前需要思考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研究理念必须更新,必须跟上时代,否则就落伍了。

在中国,“常规主义”已成为创新思维的桎梏。学者赵东海在《天津日报》理论版上撰文说,明代有一人叫万户,他曾设想人能像神仙一样在天上飞,并利用风筝和火箭的原理予以试验。当试验失败时,人们只是嘲笑他白日做梦,却未能鼓励地将试验继续做下去。而美国人莱特兄弟通过反复试验,修正前人数据,终于在1903年12月17日,成功地完成了动力飞机“雏鹰”的试飞,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赵东海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趋向保守的,理性的,不愿接受那些尚未成为事实的事物,……有时候,创新的机遇就在我们面前,可惜因为思维定势的干扰,让我们无法看到创新的意义,甚至还会因为自己产生创新的念头而惭愧。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转换自己的观念,摆脱旧有想法的桎梏。”

客观地分析中国三十年的服饰研究,对新

理念的认识确是十分欠缺的,甚至说整个社科界的研究氛围都是沉闷的,不喜欢也不愿意承认新学科。以中国服饰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就能看出,我们既不能再以“衣冠大国”、“礼仪之邦”来炫耀,也未能跻身于国际T台的主流,也就是说我们在服饰的现代实践与研究中要想赶上发达国家还要走很长的路。

近五年,笔者(华梅)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一个是“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一个是“东方服饰设计审美研究”。前者是探求中国正史中关于舆服制度的重要性,因为它关乎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串起来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车旗服御所占的位置以及所显现的问题。后者则是放大到世界东方的概念形成脉络和文化构成模式,进而为东方人的文化精神与着装观念。最近,进行八年的“服饰跨学科研究”又获批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将以“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成果出现。这一部百万字大书将以服饰政治学、服饰经济学、服饰文艺学、服饰科技学、服饰军事学、服饰考古学、服饰教育学、服饰民族学的八部分论述呈现出来。无疑,这又是一次新的尝试。理论总需要更新的,关键是先有这个意识。

参考文献:

- [1][美]威尔·杜兰特. 东方的遗产[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 [2][美]菲利普·李·拉尔夫, 罗伯特·E·罗纳, 斯坦迪什·米查姆等. 世界文明史[M]. 赵丰等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6.
- [3][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 吴象婴, 梁赤尼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4][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M]. 陈景彪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 [5][美]李露晔. 当中国称霸海上[M]. 邱钟麟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6][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7][法]丹纳. 艺术哲学: 下册[M]. 傅雷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 [8]华梅. 人类服饰文化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 [9][英]. 伯特兰·罗素. 自由之路[M]. 李国山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 [10][战国]荀况. 荀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收稿日期: 2013年12月1日)